

## 總論一：香港政治的三重誤判

香港回歸前24年，香港政治經歷了一個變型走樣的過程，由治而亂，由在「一國兩制」框架內良性發展，到出現要突破「一國」的惡性衝擊。這一系列狂衝出軌的瘋狂列車，在2020年6月30日晚上11時《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被中央硬生生拉回原來的軌道之上，香港的二次回歸，由是開始。

要了解香港這一段衝向地獄的狂亂歲月的由來，或許要先了解國際政治的大背景。

故事由1971年開始。當年是毛澤東仍然大力反美國帝國主義（Anti-American Imperialism）的年代，但隨着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總統尼克遜接着訪問中國，中美關係快速改善，最後兩國在1979年建交。我當時只有十來歲，也很奇怪這兩個死敵，為何可以言歸於好。長大後才明白，因為他們有共同敵人——蘇聯。

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邏輯下，中美這兩個死對頭，就這樣成為朋友，雖然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資本主義頭號

帝國，但這種「大纜都扯唔埋」的結盟關係，竟然可以維持幾十年。在這大背景下，鄧小平在1978年帶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對外開放，但若沒有中美友好的前提，中國想發展勞工密集的製造業經濟，由於缺乏出口市場，就不是那麼容易成功了。

中美修好的頭20年，直至1990年鐵幕垮台及1991年蘇聯解體，開始發生質變，中美兩國的共同敵人蘇聯，在一夜間消失。對中國而言，這沒有甚麼大不了，中國很快站穩腳跟，還是在搞改革開放，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但對美國的影響就大了，一個幾十年的老對手垮掉，美國當然意氣風發，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民主制是「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理論，西方世界信以為真。

政治從來都是尋找敵人的遊戲，當美國頭號敵人蘇聯消失，中國的狀況就有點危險了。

無論如何，中國還是有點運氣的，2001年9月，美國發生「911事件」，由恐怖份子拉登發動的襲擊，把紐約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這兩幢標誌性建築物，硬生生炸掉，從此改變了美國人的思想。順帶一提，拉登的基地組織誕生，也跟美國有關，拉登原是沙地富家公子，參與伊斯蘭革命，在阿富汗反對蘇聯入侵壓逼伊斯蘭教眾。拉登崛起初期得到美國暗助，美國

到處培養「敵人的敵人」，扶助如拉登這一類武裝遊擊隊對抗蘇聯，這是美國一貫技倆。但蘇聯解體後，拉登這些美國在中東的棋子，美國就棄而不顧，正如美國近年在敘利亞放棄庫爾德族軍事組織一樣，美國是用完即棄的。

當美國尋找敵人的時候，拉登也在尋找敵人，他盯上了美國這壓逼伊斯蘭世界的世界霸主，向美國發動恐襲。在蘇聯解體後，正當美國國內慢慢醞釀出反華聲音，想把中國鎖定為主要敵人的時候，「911」襲擊的出現，瞬即改變了形勢。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殊，極欲拉攏中國作為反恐盟友。那時中國已進行多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美國對中國加入世貿原有保留，但在「911事件」後，美國就急速轉向，歡迎中國入世，中國於是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貿組織，正式成為第143名成員。2002年11月，小布殊首次訪京，中美關係在反恐聲中又步向高峰。

入世後令中國市場大幅擴大，令中國經濟走上新的台階，慢慢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進入首二名。美國放生中國入世，錯失了狙擊中國的最好時機，現在中國已發展至美國不能阻壓的地步。

2011年5月2日，奧巴馬任美國總統時期，美國特種部隊在巴基斯坦擊殺拉登，美國反恐步入尾聲。這時美國開始把中國認

定為頭號敵人，美國國務卿希拉莉於2011年10月，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Return to Asia”一文，宣示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從時間上而言，充份看到美國眼中頭號敵人的轉移。

美國雖則已定好重返亞洲的策略，但在民主黨執政的時期，美國對華的敵意，還是比較隱性的。直至2017年，民粹式的總統特朗普上台後，對華敵意就完全暴露，特朗普打出「美國優先」的旗號，在2018年公然向中國發動貿易戰，中美關係質變開始了。

美國之變，也影響對香港的態度。比較香港兩場反政府運動，也可以看到美國對港政策的轉變。在2014年「佔中」的時候，聞說美國初時的態度是支持的，但運動發生兩星期後，美國就認為如旺角那種相當失控的局面，會影響香港民眾對民主運動的看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甚至去過旺角，勸示威者回家。但到了2019年香港發生反修例群眾運動，特朗普政府對港態度已180度轉變，全面支持香港群眾運動，副總統彭斯接見黎智英。美國顯然想用盡香港，在貿易戰上向中國施壓。

國際形勢已然大變，中美關係全面質變，香港人對這類環球政治大變化，既無興趣亦無感知，完全不了解在中美鬥爭中，香港已淪為美國進攻中國的棋子。

國際形勢大變，香港人的認知不變。香港政治出現過去幾年的亂局，和包括政府高官在內的從政者對政治形勢誤判有關。香港的政府高官主要是行政管理型，政治閱歷本已不深，對國際政治了解更少，甚至毫無興趣去了解，出席國際場合，只視為爭取曝光的活動，對國際政治的凶險，一無所知，亦不懂從國家的層面去研究問題，所以容易出現誤判。

香港從政過去幾年對政治有三個誤判。

### **誤判一：將中美之爭看成良性競爭**

過去中美關係良好，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同時和美國保持良好關係。但自從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關係急促惡化，但港府高官以至建制派，仍然將中美之爭看成良性競爭，主觀上想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甚至有時會站在美國一方，結果就完全低估美國干預香港政局的可能性。在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特區政府開始時就完全沒有考慮這場運動可能不只是香港內部的政治矛盾，而是有美國等外部力量在參與攪局。

中美關係已經發展到一種惡性競爭的關係，主要因為中國經濟崛起，其 GDP 佔美國 GDP 已經超過70%，美國深感威脅，所以要全方位打擊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例子，一個新興強國崛起

時，很可能和傳統強國爆發劇烈衝突，最後甚至難免一戰，這就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可參考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註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中央判斷中美之間已經出現惡性競爭，並推演未來的發展路徑，估計朝向2028年，即中國GDP可能超過美國的那一年，中美之間的衝突會愈演愈烈。在中美衝突將來可能升溫而不是降溫的前提下，中央處理香港問題、台灣問題時，這些小局只能服從大局，不能容許香港出亂子，拖累全中國，這就是中央對香港採取強硬政策的基本思路。

### **誤判二：將本地敵我矛盾看成人民內部矛盾**

中美之間出現惡性競爭，美國一定動用所有力量干預香港，令香港出現政治動盪，亦會鼓勵台灣插手香港，這樣就會把香港本地的政治矛盾，或許本來只是人民內部矛盾，轉變成為敵我矛盾。本地的反對派政客，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敵人的棋子，行為愈搞愈激，客觀上支持各種政變行為，最後騎虎難下。

### **誤判三：將政治質變看成量變**

將政治質變看成量變。當反對派在不知不覺間，慢慢變成外國的棋子，由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搞出一場「顏色革命」之後，特區政府卻不能夠清楚認識這種轉化，在2019年的風暴當中，還對反對派的建議，言聽計從，就會出現種種失誤，例如政府裏有人竟想接受對方提出的「五大訴求」，自毀長城。特區政府態度軟弱，沒有作戰思維，根本不能應對那場國際級的大風暴。

直到今天，部份政府高層還沒有充份認識質變已然發生，局面稍為穩定下來，又想回到過去，想回復那種政治開放的日子，想盡量吸取泛民加入政府，想盡量聽泛民的意見。其實這種和諧美好的舊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

本地政治在中央主導下，已發生三大戰略轉移，從政者要盡快掌握。

### 1. 由發展民主變成追求秩序。

回歸24年，香港政制不斷開放，政制改革是香港最主要的政治議題，彷彿發展民主，發展普選，是香港唯一而最大的政治目標。民主自由就變成香港最主要的意識形態，而政府也圍着這個主題去轉。不過香港發展民主的道路，並沒有帶來好結局，從2014年的「佔中」，到2019年的暴動，完全顯示香港的民主

化走上了歪路。本地政治第一個戰略轉移，就是要由發展民主，改為追求秩序，穩定壓倒一切。秩序和效率，將取代民主主義，成為本地從政者要追求的重要價值。

這個轉移的過程，由中央三個大動作完成，第一就是2020年制定《港區國安法》，第二就是2021年完善香港政制，第三個動作是在2021年和2022年轉換特區政府的班子。三個動作將徹底地將發展民主的路向扭轉。所以無論政府或從政者，也無需要再堅持香港一定要發展民主。在阿爺的眼中，香港首先要回復秩序，施政首先講求效率，若不能達到這兩個前提，發展民主的目標，可以先叫停了。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68年的作品《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提出新興國家或地區遇上的發展問題，當舊社會瓦解，新社會建立時，由於所有舊社會組織紐帶都已經斷裂，政治參與急速上升，社會群體連繫薄弱，結果就會出現失序的情況，很多非殖化的國家和地區，引入西方式民主，結果變成一場混亂。恐怕香港也要面對這樣的困局，在外地政治勢力干預下，情況就更糟糕了。

### 2. 由多元開放轉向愛國主義。

香港過去是一個國際城市，回歸24年的初段，中美關係良好，

香港也可以扮演一個中美之間的中間人角色。如今中美關係決裂，實際上已經陷入新的冷戰當中，香港過去面向國際時的多元開放空間，早已消失了。

香港人要開始選擇，要麼支持美國，要麼支持中國，但如果你留在香港，支持美國的空間是不大的。香港面對的戰略轉移，要由多元主義轉向愛國主義，從政者要站穩愛國的定位，才有發展的空間，否則阿爺會覺得你勾結外地，必定繼續打壓，沒有太多生存空間。在如今中美衝突的國際環境下，香港人的心態必須轉移。

### 3. 由實用主義轉向意識型態主導。

香港從政者過去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實用主義，現實上就是不斷做政治交易，以換取支持，總之事情能在立法會投票通過就可以了，有一種「過得海便是神仙」的心態。

最典型的例子是2010年的第一次高鐵撥款，在政府提出撥款之初，支持的民意有七成，反對的有三成，但反對者不斷提出各種理由來攻擊，特區政府就鮮有回應，到立法會投票之前，支持和反對已經變成五五之比。當時我和負責的官員溝通，問他們為何不反駁錯誤的反對意見，他們的回應是只要立法會能通過就好了，不用反駁，以免挑起事端。政府這種實用主義的心

態，客觀上大量丟失意識形態陣地，令年輕人覺得民主自由的價值至高無上，無論政府或者建制派只是一班庸碌無能的廢物，只是因為利益而聚集，年輕人羞與為伍。

政府也好像染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好比一個被綁匪劫持的富家女，最後完全認同綁匪的價值，即使被拯救出來後，富家女也不願意上庭作證指控綁匪。當特區政府高官完全認同反對派的民主自由價值之後，做事常覺得自己理虧，於是不斷用利益去收買反對派，例如本屆政府上任時提出要每年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性撥款去收買教協，但這種行動只是養大反對派，並沒有獲得真正的支持。

未來香港的從政者要摒棄實用主義，要重新高舉意識形態，要定位在愛國主義和效率主義的基礎上，敢於發言，敢於抗爭，否則即使完善了政制，特區政府仍然不能重新收穫民心。